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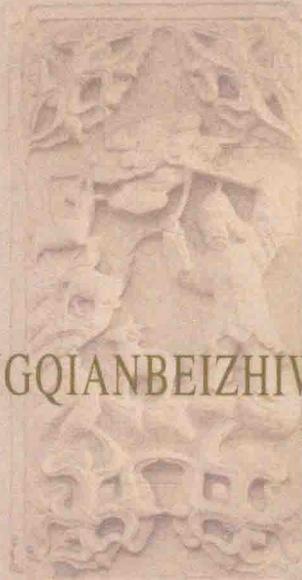


教育部“211工程”三期建設項目

唐前碑志文研究

李贵银 ● 著

TANGQIANBEIZHIWENYANJIU



辽海出版社

唐前碑志文研究

李贵银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前碑志文研究 / 李贵银著.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451-0698-5

I. ①唐… II. ①李… III. ①碑文—文体—研究—
中国—古代 IV. ①K877. 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3945 号

责任编辑: 陈晓玉

责任校对: 文 玉

装帧设计: 丁 凡

出版者: 辽海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电 话: 024-23284588

印 刷 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18

字 数: 2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高凯征 张晶 主编

教育部“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目 录

引 言	1
一、研究对象的范围	1
二、选题的意义	2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5
四、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9
五、研究情况概述	10
第一章 碑志文的文体渊源及文体规范	18
第一节 碑文与铭文的文体渊源	22
一、由器物之碑到载文之碑——碑为铭文的载体	22
二、碑文与铭文文体职能的承转	27
三、碑文对铭文文体特征的继承	35
第二节 碑志文与《诗经》雅、颂的文体渊源	38
一、《诗经·鲁颂》在颂体流变中的意义及其对碑文的影响 ..	39
二、碑载颂文及碑文对《诗经》颂诗、雅诗写作手法的继承 ..	45
第三节 墓碑文与诔文的交互影响	51
一、墓碑文与诔文文体职能的一致性	51
二、墓碑文与诔文在文体特征上的交互影响	55
第四节 碑志文的文体规范	61
一、碑文文体规范总述	61
二、碑志文各子类文体规范略述	67
第二章 唐前碑志文创作的发展与演变	74
第一节 唐前纪功碑创作	75

唐前碑志文研究

一、文字古朴、格式初定的秦刻石	75
二、汉魏时期的纪功碑创作	81
三、南北朝时期的纪功碑创作	87
第二节 唐前墓碑文与墓志铭创作	94
一、东汉墓碑文创作	95
二、魏晋时期的墓碑文创作	104
三、南北朝及隋代的墓碑文与墓志铭创作	112
第三节 南北朝及隋代的佛道碑文创作	125
一、佛道碑文对儒家铭功颂德传统的继承及其宗教转化	125
二、南北朝及隋代佛道碑文的时代特点	129
第三章 唐前碑志文批评	134
第一节 先秦至两汉时期的碑文批评	135
一、礼制统摄下的铭论——《左传》与《礼记》论铭	136
二、以碑为典艺——刘熙《释名·释典艺》	138
三、蔡邕的《铭论》及其碑文作品所体现的碑文观	140
第二节 魏晋碑文批评	146
一、曹丕的《典论·论文》	147
二、陆机的《文赋》	150
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	156
四、桓范的《世要论》	159
第三节 南北朝及隋代的碑志文批评	161
一、从文学角度论碑	161
二、从政教角度论碑	169
第四节 刘勰的碑文观	175
一、碑文源流观	176
二、碑文作家作品论	182
三、碑文体制论	185

第四章 唐前碑志文批评对后世的影响	190
第一节 唐前碑志文源流观及作家作品论对后世文体 论著的影响	190
一、陆机的“碑披文以相质”所引发的“碑非文名”的争论	191
二、唐前碑文源流观对后世文体论著的影响	194
三、唐前碑志文作家作品论对后世的影响	199
第二节 碑志文与史的关系对唐后碑志文批评与创作的影响	204
一、碑志文与史的关系在唐后碑志文批评中的演变	205
二、唐后以史笔为碑志遭遇的现实困境	210
第五章 碑志文的人文蕴涵	222
第一节 礼与碑志文	223
一、遵守铭功颂德的等级性	224
二、彰显德与孝的观念	229
三、宣扬教化的作用	233
第二节 三不朽观念与唐前碑志文创作	237
一、由铭到碑的文体发展与不朽观的转变	238
二、立德、立功、立言的层次差异及其在唐前碑志文创作中 的体现	241
三、三不朽价值观与碑志文文体兴盛之间的关系	246
第三节 时代风尚与唐前碑志文创作	250
一、人物品藻观念的变迁在唐前碑志文创作中的体现	251
二、宗族观念与唐前碑志文创作	260
结 束 语	267
参考文献	271

引言

一、研究对象的范围

碑志文是碑文与墓志铭的合称。碑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碑文包括一切刊于石碑上的文字；狭义的碑文指的是刊在石碑上的记颂生者生平事迹、功勋，先贤或已故父祖行治、才德、功绩等以垂示后昆为目的的述德颂美类文字。墓志铭是一种相对后起的碑文样式。从形制上看，墓志大多为方形，有志有盖，埋于墓侧，与立于墓上的墓碑不同。墓志铭是迫于统治阶级禁碑的压力，与志墓的习俗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墓碑形式。本文的研究范围主要针对狭义的碑文与墓志铭。对于这一类文字，人们相沿既久，习惯上称之为碑志文或碑版文，本文沿用碑志文这一称谓。

碑志文从东汉时期盛行于世，创作一直绵延至今。本文截取唐前这一历史横断面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从文体研究的角度来看，唐前是碑志文体制与文体规范形成、确立，

并在创作与批评上达到鼎盛的时期。考察这一时期的碑志文创作，可理清碑志文的文体源流与文体规范，并理清碑志文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二是从文体史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对唐前碑志文发展与演变轨迹的把握，能够为整个碑志文学史的研究奠定基础。唐前是碑志文文体规范形成与确立的时期。唐代以后的碑志文创作或体现了对唐前所确立的碑志文体制规范的遵守，或体现了对规范的背离与新变。要之，无论是遵守还是新变，都是在唐前既已形成的文体规范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对唐前碑志文创作与批评的研究，是构建中国碑志文学史研究大厦的基石，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选题的意义

碑志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一支，有着巨大的创作数量。然而，由于古今文体观念的差异，人们往往将其视作歌功颂德的谀墓之文，简单地将其归入实用文体之类而对其文学价值关注不够。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是一种杂文学观，文学文体与实用文体共同组成了文学的大家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了三十多种文体，其中除诗、赋、乐府等少数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纯文学意义上的文体之外，大部分文体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实用性文体。在杂文学观念的影响或指导下，古人们对这些文体的创作都予以重视。从古代文体的创作实际来看，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技巧的演进，以及人文精神的发展变迁等等，在这些我们今天所说的实用性文体的创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因此，如果从今天的纯

文学观念出发去研究古代的文体，必然失之偏颇，而不足以全方位地展现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文体研究的全貌。正如吴承学所说：“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然一体的，因此我们就需要突破现代文学观念的局限，从古代特有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出发，对古代文体的丰富实践进行符合实际的理解、研究。”^①翻检中国历代文学作品总集、选集、作家的别集，碑志文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一些文章大家的文集中，碑志文更是占了很大的比重。蔡邕集中碑铭之作占其文的三分之二以上，庾信的碑志文也占了其文集的大多数，韩愈、欧阳修、王安石、元好问等文章大家也都创作了大量的碑志文。因此，如果忽视碑志文的研究，便不足以展现作家的创作全貌，也不足以展示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全貌。

从文体研究的角度讲，唐前碑志文研究有助于填补目前文体研究的空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体研究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童庆炳等主编的文体学丛书，引进西方的文体学理论对中国的文体理论进行研究。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综合探讨了古代各种文体的基本特征。郭英德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是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总体的、综合的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结构、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中国古代文体的命名方式、中国历代《文选》类总集的文体排序原则等方面。关于唐代以前文体论研究的论著主要有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李士彪《魏晋南北朝

^①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文学遗产》2005 年第 1 期。

文体学》、贾奋然《六朝文体批评研究》。深入研究某一文体的形态流变的著作，有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等。

就目前的文体学研究现状来看，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学总体的、综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对某一文体的具体的深入研究还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特别是对那些在今天看来属实用性质的文体，而这些文体，在中国古代文体中占有很大比重。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综合研究应建立在对各种文体的具体的、深入的研究基础上，由此得出的结论才是有的放矢，符合中国古代文体实际的。若脱离了对具体文体的研究而进行对中国古代文体学总体的、综合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始终是与中国古代文体的创作实际相隔阂的。因此，本文就尝试着对碑志文这一文体进行具体的研究，选取唐前这一横断面，就是试图对碑志文这一文体在唐前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做深入的研究，理清碑志文的文体源流，体制特点与创作规范，并梳理汉魏六朝时期人们有关碑志文的理论批评。古人对某种文体的认识，不仅体现在对这一文体的批评中，也体现在文体的创作实践中。因此，通过对唐前碑志文创作与批评的理论研究，大体可以得出唐前人们对碑志文这一文体的比较全面的认识。最大程度贴近古人的原意，探求古人之用心，是本文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本文正是力求通过对碑志文具体的、深入的研究，为综合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做一点具体的、有益的工作。

从古代文体的创作实践上看，

从古代文体的批评上看，

从古代文体的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文采取文体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我们今天所说的“文体”一词，更多的是一个现代合成概念，是受西方文论浸染甚深的一个概念，与古代文体学语境里的“文体”一词并不是完全对应的。中国古代文体学中“体”的概念，义项繁多，层次不一，通常指体裁或文类，如胡应麟认为：“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①文体还包括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体要、体性等方面，“体”是涵盖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其下的一些概念则分派不同，例如，其中体性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风格”，这种风格又可以指某一类文体的风格、具体作家的风格、具体作品的体貌特征、某一历史时期文章的总体风貌特色、流派的风貌特征等方面。^②中国古人所使用的文体概念，是一个泛文化的概念，其囊括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正如袁济喜先生所指出的：“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文体问题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形式问题，而是与诸多问题相关联的范畴。”^③中国古代的文体概念与西方偏重形式因素有着鲜明的不同。西方众多权威工具书在对风格（即文体）一词进行界定时，

①[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

③袁济喜：“六朝文体论的人文蕴涵”，《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

大都偏重于作品的形式层面。如 H.肖 (H.Shaw) 主编的《文学术语辞典》将文体界定为“将思想纳入语词的方式 (the manner of putting thoughts into words)”，并明确声称：文体是“涉及表达方式而不是所表达的思想的文学选择的特征。”^①由于中西、古今文体概念所指的差异，若从今天受西方浸染甚深的文体概念出发去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体，容易失却古代文体内涵的很多精髓部分。因此，对古代文体的研究，应从中国古代固有的文体观念与文体实践出发，最大程度地贴合古代文体的内涵，包罗古人文体概念所指称的范围。

刘勰《文心雕龙》所体现的文体论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代表。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表明他对各类文体的研究采取的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研究方法。“原始以表末”是对文体产生的源流予以廓清。刘勰论文非常重视“沿波而讨源”，在对具体文体进行研究时，力图追溯其源。“释名以章义”是对文体名称、文体范围的确定。“选文以定篇”是评论历代作家创作的得失成败，对那些在文体发展过程中具备某种示范作用的篇章予以品评。刘勰评论的作家作品带有一定的跨度，因此“选文以定篇”揭示了一段时期内文体创作的演变。“敷理以举统”是建立在历代作家创作得失的基础上，对文体的创作规范予以确定。刘勰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其实蕴涵了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基本内容与范围。刘勰的文体研究方法，基本包括了文体源流、

①转引自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作家作品及文体规范或文体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刘勰的文体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文体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对唐前碑志文的文体研究就以文体源流研究、作家作品研究、体制规范及风格特点的研究等为主要内容。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①刘勰这里指出了时代风尚的变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时代风尚是一种表层现象，是内在的精神价值与社会心理共同作用的产物，这在文学的创作与文体的发展中也会反映出来。在中国古人看来，文体的创作不仅是文学现象，文学所反映的也不单纯是形式技巧的问题，其中深蕴了人文的内涵。中国古代的文体论，就非常重视对文体的人文蕴涵的挖掘。袁济喜先生在《六朝文体论的人文蕴涵》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体论与西方文论偏重形式本身的思维相比，始终强调文体与文原的不粘不脱，使文体问题与整个宇宙自然融合在一起，不致成为一种孤立的形式问题，以此来激活文体的创新能力。”^②对文体创作深层的人文蕴涵的挖掘，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一个重要传统，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文体研究借鉴和发扬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文体源流研究、文体体制规范研究、作家作品研究及文体深蕴的人文内涵的研究，构成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

对某一文体的具体研究，也离不开文学研究的方法。文体学

^①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1页、第675页。

^②袁济喜：“六朝文体论的人文蕴涵”，《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

与文学的研究都以作家作品的研究为基础，文学研究的方法，是文体研究所必须的。正如吴承学所说，古代文体学与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之间存在着学科的互动。^①文学史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各类文体发展史的综合。文体学与文学史的研究因视角的不同，在价值判断上存在着差异，有些作品艺术水平并不高，在文学史上未必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由于其在文体形态上有着独特之处，在文体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因此，在针对某一文体的研究时，对那些在文体形态形成与定型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家、作品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如李斯的《琅琊台刻石》，质木无文，然而因其具备了“序”这一形式，在碑志文体制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对唐前碑志文进行研究时，对那些在文体体制与文体规范的形成与定型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篇章及起奠基作用的作家，对他们的地位与影响应予以关注与肯定。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兴盛的时期。伴随着文学的自觉，文学独立意识的日益增强，文体辨析意识也日益深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碑志文批评涉及碑志文的源流、作家作品等方面，对于我们把握唐前碑志文的发展及其创作有重要意义。唐前的碑志文批评也对后世的碑志文批评及其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唐前有关碑志文的理论批评也应纳入到碑志文研究的范围之内。

综合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实践与今人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确立了文体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并结合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成果，对唐前的碑志文进行研究。

^①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

在结构上包括：碑志文的溯源、唐前碑志文的发展与演变、唐前碑志文批评、唐前碑志文批评对后世的影响、唐前碑志文的人文蕴涵五个部分。

四、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碑是一种因器立名的文体，最初是一种器物，由于承载了文字，逐渐发展为文体。碑作为器物承载过铭、颂、诔等多种文体，碑文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吸取了多种文体的特点。墓志铭相对于碑文来说是一种后起的碑文样式，它的产生与人们的志墓习俗及魏晋以来的禁碑政策有密切关系。碑志文的产生还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因此，对碑志文源流的考察往往是文体渊源的考察与器物的考辨、文化根源的追溯相交织，再加之先秦文献的流传问题，碑志文的发现又有待于考古的发掘。因此，对碑志文源流的考察是碑志文研究的一个难点。

唐前的碑志文文献，多有散佚，给研究带来了一定难度。由于作品的散佚，大量作品并非完整的篇章，且很多作品的创作年代无法考定，无法准确地判定具体作品在碑志文文体形态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这些都给文体结构与体制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本文在对唐前碑志文的发展与演变进行论述时，不得不参照文学史以时代为序进行分期，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体形态的演进轨迹。但是，本文也力图克服这一弊病，对于那些在文体结构形态定型过程中有重要意义的具体篇章及作家予以揭示。

对文体的人文蕴涵的揭示需要文化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知

识储备，特别是要从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形态出发。由于笔者学识所限，对碑志文的人文蕴涵的揭示也是本文的一个难点。

五、研究情况概述

中国古代与碑志文研究相关的有两门重要的学问：一是繁兴于宋代的金石学，一是盛行于清代的碑学。从金石学与书法角度研究碑文，成果可谓丰硕。宋代金石学的风气大盛，元明金石研究式微，至清代又重新兴盛，出现了许多名作。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郑樵《通志·金石略》、洪适《隶释》、《续隶释》、清人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洪颐煊《平津堂读碑记》、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中均收录了大量的碑志。以元代潘昂宵《金石例》发端，引出了一系列金石例方面的著作。王行《墓铭举例》、黄宗羲《金石要例》、梁玉绳《志例》、李富豫《汉魏六朝墓志纂例》、冯登府《金石综例》、吴镐《汉魏六朝墓金石例》、《唐人志墓诸例》、叶昌炽《语石》、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金石学研究成果为碑志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一些整理文献如赵超的《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周绍良主编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还有台湾出版的《历代石刻史料新编》等，这些整理文献也为碑志文研究提供了材料上的方便。

古代、近代的文体论著作也有从文体角度论述碑文的。唐代以前论及碑的作品主要有《礼记》、蔡邕的《铭论》、曹丕的《典